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八期 ——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1b)

【艰难岁月】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下)	丁凯文
【文革一页】五七干校述论	郑 谦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艰难岁月】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下)

• 丁凯文 •

十八、从“九一三”到“九二四”

”9 1 3 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士，也就是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现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众口一辞重复这样一个说辞：毛主席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汪东兴的回忆最具代表性。汪说：“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吗？我们来看吴法宪是怎么叙述这十天的经历的：

9月13日，中午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处理完有关事宜后，下午一点与李德生、杨德中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政治局集体办公，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吴根据周恩来指示，命令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晚上九点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和总参其他干部开会，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应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周黄二人都认为空军目前部署得当，不必再作变动，但要坚决防止飞机外逃。当晚吴法宪与周恩来一起

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9月14日，吴法宪再次向空军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坚决执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点周恩来再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会，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周亲自电话部署到全国各大军区。晚九时政治局会议，通报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决定。吴法宪还建议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

9月15日，空军司令部报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午三点黄吴到周恩来处办公。下午五时得外交部报告证实一架中国飞机坠毁于外蒙，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周询问了有关三叉戟飞机一些事宜。随后周去向毛作汇报。

9月16日，上午吴法宪致电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检查空军各机场状况，下午三时向周恩来作汇报，周表示满意。五时周要吴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辨认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飞机人员照片。晚上八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周还建议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文件，并说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周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与周二人共同的回忆林彪以往的十六条错误，诸如，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线赞扬反围剿中搞“短促突击”等等。写到这里，吴法宪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会议最后周宣布空军由曹里怀、王辉球等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此举实乃变相夺了吴法宪的空军指挥权。当晚，周恩来还宣布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庆贺，每人一杯。（由此可见，林彪实是江青、张春桥的心头大患，林彪之死江张最高兴。据笔者所知，毛泽东也喝了酒，表示了庆贺。）

9月17日，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回空军开会，周恩来要吴开会揭发批判林彪，要稳定空军和民航，并派亲信杨德中到空军与会了解情况。吴回到空军后立即召开空军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林彪外逃事件，并首先作检查。杨德中听会到中午。晚上周恩来发现空军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广州，吴立即命令广州空军查明情况，将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时周恩来电告吴法宪，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获，同时命令吴加强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当晚深夜，吴才回到家，见到自己的夫人，告诉她这些天发生的情况，并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9月18日，吴法宪到空军司令部开会，继续揭批林彪、林立果，并要求空军副司令曾国华召集空直机关大会，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晚上吴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会议通过了该文件，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散会后，吴回到空司继续参加会议。

9月19日，上午处理空军日常事务，通知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问题，并开始考虑如何写检讨上报中央。下午三时，吴法宪等人接周恩来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研究民航问题，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机上查到一份名单，周恩来要求将有关人等查清并予以关押审查。下午吴法宪还到西山参加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周恩来指示黄永胜负责传达中央文件。回到空军大院后，周恩来又告诉吴，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吴共同负责。

9月20日，凌晨李德生找吴法宪研究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名单，然后按周恩来指示将这批人押赴亚非疗养院监管审查。上午，李德生和吴法宪向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

五十七号文件。下午李德生、杨德中参与了吴法宪召开的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晚上还与民航副局长马仁辉研讨民航如何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9月21日，凌晨起，吴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凌晨四点才睡觉。上午继续主持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到下午六时。

9月22日，上午检查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后双方的团结合作问题。下午三点吴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下午四点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到晚上十点。会后吴与李德生分别找了住在三〇一医院的广州空军政委龙道权和南京空军司令刘懋功谈话，传达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要求他们回本单位主持工作。谈完话后，吴法宪在办公室主持起草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的会议报告，准备上报中央，一直搞到凌晨四时才睡觉。

9月23日，吴法宪在办公室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下午二时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再次作了检讨，并让秘书记录，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并与24日凌晨四点发出，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当晚十时左右，吴还接到周恩来指示，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空军作战部搞好后由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审阅签署上报。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还主动记录了吴在9月12日晚和13日做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包括他在场听到的来往电话和吴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

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极为完整的记录了从9月13日当天到24日被拘押前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了吴法宪在“913事件”后严格按照党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完成了周恩来交代的各项任务。这里面还穿插地记录了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活动，特别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活动。据笔者所知，李作鹏、邱会作在海军和总后也一样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稳定军队，防止外敌入侵的工作。事实证明，“913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十分依赖黄吴李邱几员军内大将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这一情况，这些所谓的罪状不过就是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汪东兴！汪东兴积极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尽快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意图灭口以掩盖汪东兴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现在是我们还原这段历史原貌的时候了。

十九、从关押审查到进入秦城监狱

1970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四大将在人民大会堂被拘捕。吴法宪自己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吴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咱们这几个了！”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这番“组织上会照顾好家属”的诺言并未兑现，黄吴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残酷迫害。）随后吴法宪被送到北京郊区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部，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左右，却没有任何审问，生活待遇也还不错。吴法宪等人为什么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送进秦城监狱？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搞的区别对待有关系。黄吴李邱四人无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牵连，他们本人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反毛举措，此时此刻他们也己不构成对毛泽东和文革大业的任何威胁，先把他们养起来，如同邓小平一样，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毛泽东要打击其他对手时还可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再加上“913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一度重病缠身，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从1971年11月20日到1972年4月，吴法宪经历了五次提审，主要是公安部长

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二人为主，有时还有郭玉峰和杨德中。所谓的提审，就是要吴法宪交代林彪要搞政变的“事实”，如“叶群在1971年8月8日的活动”、“庐山会议就是一场军事政变”、“谋害毛泽东”、“攻打钓鱼台”、“256号飞机的调度”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经过几次提审，吴发现“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也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举例来说，所谓“叶群策划的八八密谋政变事宜”，原本是叶群怀疑自己患了乳癌，8月上旬从北戴河回京到三〇一医院检查身体。8月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说，康生生病了，情绪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给康生写个字表示一下慰问。毛泽东想到以前曾给林彪抄录过曹操的《龟虽寿》，于是毛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出来送康生一阅。于是周让吴法宪专程去叶群处取来。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和邱会作连袂去毛家湾取毛泽东的手书。当晚叶群与吴邱等人闲聊一阵儿女婚姻之事，8月8日上午叶群返回北戴河。这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而且吴法宪还是奉了周恩来的指示去毛家湾办事。这无论如何与政变会议连不上边，更何况那时毛泽东并未南巡，没有征兆显示毛泽东决心要倒林，且黄吴李邱等人的检查也基本过关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在此时密谋策划搞政变？笔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对林彪事件的情况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问题，之所以后来越搞越复杂，无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变和杀毛的证据，自然就要从政治出发，要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后吴法宪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应该有出头之日了，连看守人员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吴法宪心存幻想，认为叶剑英和汪东兴是了解黄吴李邱的，他们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然而在年底吴法宪等人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吴法宪说“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秦城监狱的待遇远逊于北京卫戍区的待遇，卫戍区看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秦城的伙食极差，管理更是不把人当人，多是训斥叫骂，犯人提的意见几乎从无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流露出不满就会立刻遭到报复，将犯人关进狱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约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里蚊子苍蝇满屋飞，咬得人皮肤溃烂，冬天则是缺少暖气，冻得让人浑身发抖，犯人之间绝对见不到面，放风更是少得可怜……这些虐待和折磨并非仅仅针对吴法宪一个人，而是针对狱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录里记录了秦城监狱的黑暗。王力回忆说：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前五年里不给放风，不给任何有字的东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从门上的小监视孔上予以监视，睡觉甚至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监视孔。睡觉的床是两条凳子支起来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许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还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监视者可以通过监视孔予以监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早饭是四个凉窝头，不给水，不给咸菜，只能硬着头皮干啃，一天只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没有袜子，以致脚被冻出了冻疮。秦城监狱的黑暗真是罄竹难书！

秦城监狱这座毛泽东的“巴士底狱”折磨摧残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迫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是数也数不清了。吴法宪最后感叹说：“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这番话实在就是对共产党的血泪控诉

啊！

二十、“公审”和“辩护”

中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两案”审判时更是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1979年8月，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就曾特别强调“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考虑文革的历史条件，要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然而，所有涉案人员是否有罪以及判什么样的刑都是由邓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犹如傀儡，如此审案有何公正可言？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这场审判的一些内情。

（1）从1979年初到1980年7月，专案组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内容与以前相同，但是更详细和具体。吴否认了当年专案组搞出的“八八政变会议”（指1971年8月8日吴法宪、邱会作与叶群在毛家湾商讨“政变”事宜）。

（2）1980年7月后，狱方禁止吴法宪听广播、看报纸，也不许家属探视。

（3）官方指定辩护律师，按有关法律，律师与被告可以单独会见讨论案情，但每次律师与吴谈话时，必有监管人员在场监视。

（4）12月16日法庭进行辩论前，审判员却指示吴，可以发言，但是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问题，否则要判重刑。（法庭审判员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被告人）

（5）吴法宪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做申辩，吴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申辩也没用。最后法庭的辩论波澜不惊，这个“审判”的过场进行得十分顺利。

最后“特别法庭”宣判：吴法宪以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还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此外，还有诬陷罗瑞卿、贺龙，迫害空军干部等，外加将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等。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宣布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事实早已证明，这场所谓的审判既没有“以事实为根据”，更没有“以法律为准绳”，全案都是从政治出发，从执政者利益出发，全面掩盖、歪曲了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被告身上，掩饰了毛泽东的罪恶和责任。如此审案还能奢谈什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这些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判决在若干年后更显示出它是何等的错谬和颠预。

对于这个所谓的判决，吴法宪在多年后为自己作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笔者在此叙述如下：

（1）吴法宪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奋斗了一生。所谓“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实之词。从“913事件”到现在，官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吴法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相反，吴一直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是由于盲目地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会犯有左的错误，但这与所谓的“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2）关于所谓的“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是无稽之谈。林彪当年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自己“夺”来的，而是因为林彪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的赏识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毛还决定将林彪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所有这些都与林彪夺权而来的。那种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则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条罪名。至于所谓的“阴谋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虚乌有，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官方拿出一条有说服力的证据。吴法宪自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这样的

“政变”计划。

（3）吴法宪的所有职位都不是通过“夺权”的方式夺来的。吴的空军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全体与会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吴法宪自己夺来的。说到“夺权”一事，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自己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在全国搞夺权，林彪和其他老帅们在军队中都反对这样夺权。除了一些军队的文艺团体和院校有夺权现象发生，任何军队的机关和部队都没发生过夺权。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所发生的夺权，全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予以批准的。

（4）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吴法宪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吴法宪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吴法宪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吴法宪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5）关于“诬陷罗瑞卿、贺龙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自己的确犯有错误，并深深忏悔和反思。但是贺龙与罗瑞卿的问题都是毛泽东作的决定，他们二人的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吴法宪这一级别干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决定的。他们的被打倒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将贺、罗被迫害的罪责加在吴法宪等几个人身上显然极不公正。吴法宪说“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这里我想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而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共官方所极力掩盖和回避的！

（6）关于所谓“迫害空军干部”问题，文革中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吴法宪承认自己应该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主要是全国、全军搞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吴法宪等几个人的头上。吴法宪说“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7）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这是他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吴法宪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以所谓“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作为罪名来定罪更是荒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吴法宪将军的这段“辩护”虽然是在公审二十几年之后所作，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其中闪光

的内容，它说出了对文革的真正的反思，点出了官方极力回避、掩饰的关键问题，向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的真相，给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虽然吴将军的回忆也许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部回忆录必将对历史对后世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二十一、关于林立果的几个问题

林立果的情况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占很小的分量，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对林立果的问题作个简单地叙述。笔者曾撰文《重评“五七一工程”纪要》，刊登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对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了一些分析。通过阅读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对林立果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里也作一简单概述。

（1）林立果到空军。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6年文革运动兴起后，学生也不用读书了，叶群就打算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这样比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1967年初叶群向吴法宪提及此事。于是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同时指定周宇驰、刘沛丰予以帮助。半年后，叶群又提出空军能否培养林立果入党。吴法宪答应让周宇驰这个老党员注意加以培养。不久，周宇驰就报告吴法宪发展林立果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吴法宪和周宇驰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在空军党办支部会议上正式发展林立果入党。叶群知道后表示满意和高兴。此后叶群常常过问林立果的事，有时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

（2）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1968年夏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向吴建议说，林立果到空军已有一年，学习努力工作也有成绩，现在林立果希望到空军的基层锻炼一下，搞一些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意见。吴法宪对此也表示支持，并要王飞成立一个调研小组，以调研组的名义到下面去活动。事实上，吴法宪因为工作太忙，并未具体问过该调研小组的情况。1969年10月叶群又向吴法宪提出是否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中也可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及技术，也可直接向林彪汇报。吴法宪和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商量后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命令下达后，吴法宪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对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励，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后来周宇驰等人有意将此番话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响。“学毛著讲用报告”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谁作了这种报告就说明谁毛著学得好，谁就是本单位的标兵、榜样。林立果那时也不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讲用活动。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二级部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这一报告，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对于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吴法宪认为虽然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个别地方还值得推敲，所以应该收回不宜印发，此议还得到了叶群的同意，但是后来该报告还是被空军党办的一些人广为传播，将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罢不能，搞得吴日后头痛不已。

（3）林立果在空军的一些活动。1970年林立果在空军基层蹲点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这两个报告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同意后，空军党委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此外林立果在广州空军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吴法宪看过觉得有说服力，于是上报总参。这个材料还得到毛泽东、林彪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据吴法宪后来所知，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据点”，林立果和周宇驰翅膀硬了起来，不太听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吴法宪感到空军党办有些失控。吴回忆说“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

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笔者认为，林立果作为林彪的儿子，文革期间在军队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众人都是众星捧月般地供奉着他，这并不是因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么优秀，而是他背后的那种势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觑，对林立果的态度就是对林彪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对党中央的态度，此乃专制国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参军、入党和提干都大大异于普通人，他们手中拥有着有形和无形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连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都莫可奈何他们，更何况地方和军队的基层干部人员，他们自然对林立果敬若神明，言听计从。看看时下的中共太子党们，难道不是也个个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天然优势来求发展？此盖莫能外，不独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子女们，如李敏、李讷、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通过造反夺权运动一步登天。与毛家相比，林立果强他们百倍矣。林立果在空军搞了一些科研活动，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这也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

空军对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共搞宣传的常例。中共建国以来树立了很多此类榜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等。这些人都是通过大树特树搞起来的“英雄人物”。空军党办内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过搞“学毛著讲用报告”树立林立果这个新榜样、新标兵。撇开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内容，林立果还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问题，并不是只讲学毛著谈体会和大搞运动，而是强调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尽管这些内容显得口气太大，吴法宪认为“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总的说来，人们没有理由据此将林立果看成是心怀鬼胎专干坏事的“坏人”。

关于吴法宪所说的空军党办内部失控的问题，笔者认为，周宇驰等人“挟林自重”，自以为林立果可有林彪为后台，不把吴法宪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戏。但由此就证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动，显然也是证据不足。中共在“9 1 3事件”后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无非就是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谓“据点”，这些“据点”里的那些“罪证”，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些摄影、录音器材，有些还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还有“水陆两用汽车”，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军党办的秘书陈伦和回忆说“1970年4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到过广州、汕头、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沪期间未随他去过苏州和杭州。”至于中共在“9 1 3事件”后指责林立果要搞政变杀毛一事，现在再看此事，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设想而已。陈

伦和回忆说“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笔者认为，林立果其实也被中共妖魔化、脸谱化，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出自林立果的脑子和手笔，那么笔者不得不赞叹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超前思维，邓小平后来上台搞的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极左路线，搞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过就是林立果当初设想的翻版。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否定林立果的大胆和先驱的思想解放呢？在宣扬实事求是的今天，人们是不是也应摘下有色眼睛重新认识林立果其人，抛弃那些妖魔化的脸谱，还林立果一个公道？

结束语

迄今为止，本人就《吴法宪回忆录》下册已连续写了二十一个系列，前后历时整整三周时间，到现在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读书写作的时间有限，下笔难免仓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挂一漏万，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就文革史上的诸多问题，结合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随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寻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将吴将军回忆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使那些尚未读到此书的朋友们对此也有初步的了解，为日后的阅读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参考。

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综观吴法宪将军一生的经历，在中共1949年建国前，吴法宪是中共军队中的一员骁将，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具有传奇性的革命战斗经历；1949年到1966年吴法宪身不由己地卷入军内斗争的漩涡，而1966年又深深陷入文革党内斗争，以致最后身陷囹圄，受到及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吴将军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笔来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撰写了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对自己的经历和文革历史作了极为详实的记述。虽然吴将军的回忆里也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回忆录的问世足以构成对官方史学一家之言的挑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笔者愿就这个机会再次向吴将军的在天之灵表示由衷的敬意，愿将军的英灵永生！

~~~~~

## 【文革一页】

### 五七干校述论

• 郑 谦 •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

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世人面前。

#### ◇ 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

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尽管在报刊宣传中五七干校的成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的成立首先是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19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据此，各级革委会成立伊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例如，1968年初，河北省革委会把原省委、省政府全套机构精简为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仅为80人。同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肯定该县革委会把机构压缩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把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再次对精简加温。1969年7月，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精简方案中提出，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竟然是使多数机关干部成为多余人员。

当时之所以下放那么多干部，一方面是精简使原有机关容不下多少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已经失去进入新生政权的资格。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激烈的揭发、批判、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反复审查，上层建筑各部门许多人都难免戴上了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有“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的帽子。按惯例，这些人是必须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再加上派性争斗的失势者及动乱中大量的挟嫌报私之类行为，精简下放的队伍更加庞大。

如此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必然要求空前规模的干部下放——不管它以什么名目和形式出现——与之相配套。当时比较普遍采取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的办法。有的是让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或基层进行各种运动；有少数人被派到基层充实领导；有的采取举办

五七干校的做法：多数人分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9年初，某省革委会开始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到当年10月25日，全省机关、厂矿、财贸、卫生和其他事业单位共下放3万余人，其中到五七干校的有1.3万人，到农村插队劳动或蹲点劳动（以劳动为主，结合搞调查）约1.5万人；下放当工人的约有3000余人；结合劳动搞斗、批、改的近千人。此外还有百余人去当售货员和赤脚医生。某省一专区直属机关及各县直、社直机关，总共下放干部1.5万余人，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1万余人，办五七干校的5000多人。

五七干校的创办及在短期内大范围普及，还有更为广阔的背景。从1968年下半年起，为安置大学停办、中学停课却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数百万中学生，各地均已开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中城市又开始动员城镇居民“到农业第一线去”。此外，1969年，由于苏联军队接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立即展开全面的战备动员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这几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全国性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干部下放显得十分紧迫和仓促。

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一种安置干部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符合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得到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10月5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发表后，按照惯例，全国各地纷纷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集会，张贴热烈欢呼和表态的大字报。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级以上革委会都要有自己的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到1970年9月，全国来参观的已达1300多个单位，1.8万人次。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截止到1969年底，河北全省共办五七干校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

在这种热烈的场面后面，有许多无法言明的辛酸和苦涩。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于往其他地方安排的人员。1968年9月在北京郊区房山县举办的人民日报社五七干校中，学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其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主要是交代问题、罪行，接受审查”，参加劳动。1969年7月，黑龙江省主管五七干校的部门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原省直机关存在“甩包袱”思想，把大量老弱病残和“有严重问题的人送到干校”。第一批“五七战士”并不奢望与那些仍然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在职干部攀比，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是“下放干部还不算国家干部？”“在五七干校有没有毕业时间？”

#### ◇ 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理论

五七干校的产生，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时代与国情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府靠计划调控一切，国家行政权力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格外突出。这种体制在努力完成赶超战略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由此派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的代价。社会主义各国的执政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同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结果都不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

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高度重视执政后的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那样激烈、持久、不妥协地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僚化倾向，以防止党政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泽东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他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化大革命”前夕，根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他甚至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由于时代的局限，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毛泽东也把官僚主义当成旧社会的“残余”，是剥削阶级留下的东西。他认为，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出于这种认识，为了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殚精竭虑，坚韧不拔，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他还提倡通过“四大”等形式实现“大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在宪法中加上一个“罢工自由”，以扩大工人群众的权利；设想缩小工资差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尽可能地缩小等级差别，等等。由于认识未能深入到体制层次，他特别突出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他反复要求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于5月10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说：“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预计在10年左右，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就会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1963年上半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前夕，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5月20日，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单列“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一条，把它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同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四清”运动的要点之一，其中第七条便是“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65年初，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搞好运动的五条标准中，第三条便是“干部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他具有纲领性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军、民、学等

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和批判资产阶级，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赋予干部下放劳动以消灭三大差别、缩小分工等更为深刻的含义。

1968年，当毛泽东认定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时，便再一次把干部下放劳动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改革国家机关和干部教育的实验。

#### ◇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

五七干校是根据《五七指示》创办起来的，是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出后迅速普及的。尽管各地、各级、各部门的干校以及其发展各个阶段存在着各种差别，但它们在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上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一以贯之的共同点。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

“下放劳动”。把下放劳动作为干部“重新学习的根本途径”，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教育方针，是五七干校教育方针的基础和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这一教育方针既是以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继续，又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队伍的普遍批判、对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强调、对体力劳动具有反对官僚主义和“反修防修”功能绝对化的结果。与以往不同是，在当时的氛围中，干校的“生产劳动”特别强调劳动和生活的艰苦性，特别强调“越苦越累越能锻炼和考验人”，人为地强化劳动强度和生活的艰苦程度。这在建校初期尤为突出。

五七干校基本上是由一些农场改建而来，或干脆就是白手起家，这被认为是干校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建校之初，第一批学员修建校舍，开荒筑路，围湖造田，备极辛劳。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要创造一切条件，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学员打硬仗，打苦仗，让学员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找苦吃，自找压力，自觉磨炼。下了火车，不问吃的，不管住的，1600名学员拿着工具直奔江西贤进县青岚湖边，开始围湖造田。学员们整天穿着湿漉漉的棉衣，在水里泥里艰苦劳动。仅用20多天时间，修了一条4300米长、填了34万土方的围湖大坝，用18个月将一片湖底改变成5500亩稻田。他们自己采石盖房，在40多度的高温下，上面烈日晒，下边热石烤，手臂被铁锤震肿，后背晒起了层层血泡，两年共打红石88500多块，不到两年建筑了9100平方米的房屋。7月份的“双抢”时节，天最热，劳动强度也最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弯腰90度，胸怀五大洲”。在插秧时开展“50米不抬头，350米不直腰”的竞赛，以至有的人遇到田埂时已直不起腰，只能爬过去。

按照柳河干校的模式，各干校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住窝棚，吃野菜，爬大山，过沼泽”。“春寒时下水育秧，酷暑中抢收抢种，泥泞路上拉车送粪，暴风雨里防洪抢险等等，都是学员锻炼的好机会。大家在战胜苦、累、脏、难、险的斗争实践中，磨练革命意志，转变思想作风，学习生产知识。”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春夏之季，“秧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而在雨

里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里路，快速地插一遍秧，在水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

当时，这样高强度的劳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劳动是艰苦的，也正是这样艰苦的劳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建校之初，学员们或是服膺劳动能净化灵魂、纯洁道德、反修防修的道理，或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表现以期早日解脱，纷纷努力劳作。文化部干校的学员因此被当地农民称为“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

与这种劳动相配套，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建校当年，就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达到平均每人每月45斤粮，半斤油，2斤肉，30多斤菜，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

学习与运动。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以此为中心，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

五七干校虽然建在农村，但也必须像城里一样频繁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加之干校建立之初安置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他们把一些本应在原单位、在城里进行的运动带到干校，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整党建党、落实政策等等。其中的一些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

与这些无休止的运动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路线分析”。柳河干校的“路线分析”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进行两条路线上的“忆苦思甜”；二是围绕办校的方向、道路，抓住倾向性问题，进行群众性路线分析；三是采取“一言一行一对照，一事一议一飞跃”的方法，引导学员就下放劳动中表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路线分析。一时间，干校路线分析风行一时，出现了“路线斗争无小事，小事之中见路线”，“言必谈路线，行必见路线”，“从阶级斗争中查革命大节，从生活劳动中查方向，从生活小节中查精神状态”等许多口号和说法。日常工作、生活中一些小事被看成是政治方向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上纲分析，搞得人人提心吊胆，谨小慎微。

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1970年前后，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员成分已主要是在职干部或一些基层理论工作者，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

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坚持办好五·七干校，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

插队锻炼。干部虽然在五七干校里学习、劳动，但仍未能直接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为弥补这个缺陷，干校坚持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使学员在接近工农群众中学习”，“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进行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不论是长期班还是短训班，干校都组织学员定期到农村插队一段时间，进行调查，请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作忆苦思甜报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向社员宣讲党的有关政策，与他们共同进行大批判。

除了以上三项基本的教学内容外，五七干校强调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生产劳动，以期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为此，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有的文章赞美说：“进了‘五·七’干校，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同志间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气氛，使许多领导干部不仅唤起了战争年代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回忆，激发了朝气蓬勃的革命劲头”，“而且进一步破除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平等，消灭各种差别，有的五七干校还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实验。1969年底，柳河干校一些学员自发地要求进行工资改革。他们表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了使我们柳河五七干校不断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为了把我们培养成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要求立即实行体现我党光荣传统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当然，这种实验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以“斗私批修”为基本纲领，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激进的道德修炼为反修防修的基础。干校的教育方针和劳动、学习、运动、插队等学习内容安排，也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改造世界观，一定要把住要害。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个‘私’字。对干部来说，‘私’字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个‘官’字上。有些干部过去就是由一个‘私’字，追求一个‘官’字，演变成一个‘修’字。‘官’字就是要害。要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就是要狠狠打掉这个‘官’字”。要“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时，将改造世界观最终归结为解决“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问题。实际上，这些经验和总结，更多的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敷衍。学员为了应付过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以迎合当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估计，满足“斗私批修”的需要。

#### ◇ “新事物”与旧思潮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对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的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态度可以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概括。自近代以来，这种主流传统受到激烈的挑战。章太炎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挑战精英主义传统。他从道德标准出发，根据职业区分，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五四前后，“劳工神圣”之风在中国激进的知识界劲吹，19世纪俄国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农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先进的知识分子讴歌“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李达），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李大钊），表达了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在这些激进变革的思潮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出现过某些偏颇。有的用理想化色彩描绘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当做净化心灵的道德之乡和精神高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们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一些人在推崇“劳工神圣”和民众社会力量的同时，“把劳动和劳工的概念理解为体力劳动或工农劳动者”，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对“念书人”的鄙视。“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这些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要去做鞋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在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的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形势、任务的根本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随之与时俱进。“革命从城市转入了乡村，有一个是否看得起农民的问题；革命胜利了，转入城市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有一个是否看得起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虽几经反复，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失误，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不仅在实际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更在民间被戏称为“臭老九”，成为“再教育”的对象。

长期的宣传使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一种“原罪”意识，有人甚至被一种道德自卑感所笼罩。一些文化人默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认为知识分子确实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再教育”的理论。反之，一些人以“大老粗”为荣，在知识分子面前，只要亮出“大老粗”的身份，就自觉高人一等，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作为这种错误的派生物，在认识上否认脑力劳动具有劳动的性质，轻视或贬低理论、文化



以及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轻视、贬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劳动，直至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反智主义更极端的虚无主义论调。与此同时，把体力劳动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作用绝对化，把艰苦奋斗歪曲为苦行主义，希望以贫困落后的农村抵制城市舒适生活对人们的腐蚀；认为沉重的、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具有改造知识分子天然功效，蕴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尽源泉；仿佛这种苦行具有一种反修防修的神力，而贫穷则成为保持道德纯洁、精神高尚的载体，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认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社会分工、三大差别、官僚主义等问题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和觉悟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艰巨的体力劳动，通过城市乡村化、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才能解决。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这些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些科学思想被严重歪曲了，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五七干校及当时的许多“新生事物”，只有放在这些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 ◇ 五七干校的衰落

1969年至1970年，各地五七干校相继转入培训在职干部，干校开始由初创阶段进入轮训阶段。1969年8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制定出在职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规划，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学习；各级五七干校可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形式，分期分批轮训干部。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了办校的经验，要求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会议还指出，当时干校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机关实行“三三制”，干校主要是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机关精简，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干校，有的正着手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单位撤销，全部人员下放到干校。随着“斗、批、改”任务逐步完成，干部陆续分配，干校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合并，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分期分批，一般每期不少于3个月。学习期间，还要以干校为基地，实行学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各地干校的参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极左思潮受到批判和遏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初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有所调整，环境有所宽松。大部分建校初期来到干校的待分配干部或返回原单位，或重新分配工作；干校成立之初参与领导班子的各种“宣传队”陆续撤出；学员的主要成分已是在职干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干校的生产、生活条件已有较大改善，许多省、市级干校盖起了教学楼和礼堂。一些干校为保证学员的读书时间，缩减了生产规模，招收了青工、农工，建立起专业生产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办学方针上，对看书学习更为重视，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著。与此相适应，干校的组织结构有所调整，除原有的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外，又设置了教学组，配备了专职教学人员，学员队与专业生产队分离，生产、教学不断正规化。

随着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五七干校创办时期那层耀眼的光泽开始黯淡了。社会上对干校的作用不那么重视了。不少地方“提出要将五七干校搬回城里去办，有人主张换掉干校的牌子；不少单位向干校输送学员不积极，一般只送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去”。一些干校转入轮训后，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只愿意办短期读书班，不愿办下放劳动的长期班，学期也越来越

短。因干校地处农村，城里的各种运动在这里已被淡化，这又被指责为“世外桃源”或“避风港”。

五七干校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快引起注意并被着手纠正，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地方的干校没有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指出“在要不要办干校和如何办干校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斗争。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办干校，有的干校劳动时间比机关还少，甚至成了点缀”；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进干校很有必要”，强调干校要办下去，要办好，要坚持办在农村，不回城市；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不搞关门读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等等。1976年5月7日，邮电部发行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共三枚），图案为“认真读书”、“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及其各种“新生事物”都被人们以新的眼光加以审视。五七干校也不例外。1976年底，中央领导正式提出“要办好各级党校”的问题。1977年4月，中央又提出：“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都要分期分批举办干部读书班。五七干校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党校和干校都应该长期坚持，认真办好”。这种党校、干校一起办的局面立即使干校的地位矮了一截。各种报刊上有关于干校的文章骤然减少。虽然此时囿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干校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各级党校的恢复使它受到了质疑。干校是作为“旧党校”的对立物出现的，是在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中产生、发展的。党校的恢复不能不使干校处在一个十分尴尬、被迅速冷落的境地。

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兴起后，“两个凡是”的藩篱顿时瓦解。当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称为了加强和提高教育、科研工作，保证教师和科技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业务，北京、上海市委分别作出决定，不再抽调大、中、小学的教师、干部和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劳动。同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六分之五”适用于一切科技人员》的评论员文章中说：“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中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批评有的单位指定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或分配各种与业务无关的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对业务的钻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亟需纠正”。文章针对“科技人员就不要参加劳动锻炼了吗？”的质问，尖锐地批评说：“这样提出问题的同志，实际上至今还不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在他们头脑深处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扛锄头、抡大锤才是劳动。因此，他们看到科学技术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技工作，就认为是脱离‘劳动’。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思想。他们还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正是一种劳动，而且是艰苦的劳动。”

五七干校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一旦社会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它便窘态百出。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的消息中，正式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 ◇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

五七干校当初提出以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己任。一些曾在干校生活过的“五七战士”，每当忆及这段生活时也都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和突出特点的是五七干校的前期。后期的、比较正规化的干校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干校参加短期轮训的在职干部往往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已不可能对它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尽管报刊宣传中对它充满了美好的描述和热情的歌颂，但这并不能使第一批“五七战士”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都因此失去了在职干部的身份。但也有例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躲避单位里无休止的斗争、批斗，反而希望离开城市，到农村、到干校以远离漩涡，求得安宁和解脱。与那些因“问题严重”而继续留在单位里被审查的人相比，“到干校的甚至有一种被从轻发落的感觉”，老作家陈白尘在听到自己已被批准去干校时，竟“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初期的五七干校的确笼罩着一层“与工农相结合”、“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一类理想主义光环，不同于城市、机关的生活也使各类干部受到震动。柳河干校经验中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放羊娃的老干部重新拿起放羊鞭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穷苦人没有解放呵！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今天赶着羊群爬山涉水，越走越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越走越觉毛主席亲。”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表示，在干校“打掉了‘娇’、‘骄’二气”，“增加了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己原来“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郭小川也曾被干校的生活所激动，他在诗中热情地写道：“走在‘五七’路上，就像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游。”“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浪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不能说这些感情都是虚假的，确实反映了学员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认识。

以上这些只是五七干校的一面，1970年柳河干校的参观学习小组在中办干校参观时看到了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在田间，遇见不少学员，他们都身着短裤，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或干脆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块白布单。他们身上晒得黑黝黝的，确实已和见到的江西老表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些人多数年龄较大，见到外人只是笑笑，缄口不语。就是主动攀谈，也不多说些什么。”1975年仍滞留干校的郭小川再也写不出对干校的豪迈赞歌。他在诗中写出了另一种豪情：“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受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智清醒，大脑发达”。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书言事，批判江青等推行的极左路线。

五七干校逐渐远去了。但它却在中国一个特定的人群——干部、知识分子——中，留下了一段复杂、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在这里，他们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炎天烈日的盛夏和朔风凛冽的数九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他们或牧牛，或放羊，或饲鸡，或养鹅，或当厨，或采石，或筑路，或盖屋，或伐木，或栽秧，或收割，唯独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他们集体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集体吃饭，集体劳动，过着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以“五七战士”自称或相称，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实现了平等；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写检查 and 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别人或被别人揭发批判；他们屈辱、惆怅、无奈、苦闷、彷徨、怀念，有着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和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与家人天各一方，魂牵梦绕，愁肠百结，思之黯然，“一见家书便似痴”（吴祖光）；他们虽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但仍然动辄得咎，“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沈从文）；他们因有知识而被轻贱和蔑视，有的自称干校三年与鸭子“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因为“只有鸭子从没骂过我”（陈白尘）；他们也曾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收获欣慰：“小试翻天覆地手，白茅换作稻满湖”，歌颂“五七道路宽又广”（臧克家）；他们或沉醉于迥异于城市的农村风光，“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王世襄），像隐士般恬淡超然和豁达，或像战士般激情豪迈：“满腔热血，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郭小川）；他们中的多数人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仍欲振作精神，有所进取，继续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沈从文）；他们中一些人在逆境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不落井下石，不揭发别人以求自保，不怨天尤人，泰然处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坚信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一些人并未因艰苦的生活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渴望，在劳作之余读马列，看毛著，求新知，在与农民、农村

的直接接触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这种经历成为他们后来工作中的明显优势；一些人在这所“大学”里实践学习，他们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却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念也‘向阳’，怨也‘向阳’”（阎纲，当年他在文化部咸宁向阳湖畔五七干校下放劳动）。这种复杂的心境和感情，可能比较符合多数“五七战士”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也比较接近对五七干校的评价。毕竟，用一种色彩描述五七干校是远远不够的。

历史已经证明，五七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是失败的。但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忧虑是深刻的。当然，对这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 《百年潮》2006年第9、10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